舊科技、新思維——勞動的故事

■胡湘玲

這個勞動的故事開始於「很久很久以前」。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民無處棲身是德國面臨的最嚴重問題。在北萊茵－威斯法倫邦的魯爾工業區裡，一個小朋友得到一幅畫當禮物。送禮的人說：「你可以把這幅畫掛在家裡的牆上。」

「可是我們還沒有牆呢？」小朋友說。

小朋友的家人跟其他兩個家庭共用一個房間。房間的左側跟右側分屬兩家「鄰居」，他與家人就住在房中央，所以他的家── 還沒有牆。「還沒有牆」雖然道出生活的困境，卻同時也表現出生活的希望──什麼時候總是會有的。

生活貧苦是一種困境，但是沒有了希望，就是一種絕境了。在這個因爲自助人助所以仍見得著希望的困境中，Gustav von Bodelschwingh牧師從坦尙尼亞帶回非洲的傳統建築方式── 用手捏起土磚，不管大人還是小孩，男人或是女人，也不管動作便給或者行動不便，大夥兒一邊唱歌一邊跳舞，在節慶的氣氛中，將土磚一塊塊地壘起，風乾成堅固的房牆。

就像一種「 快樂的建築方式 」，在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最嚴重的黑暗時光中，貧困人家用這種「黏土麵包」蓋起房子。不僅爲自己，也爲流離失所的難民與失去家園的朋友，在中、北德區蓋了數百棟黏土麵包房子，度過這段艱苦歲月。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建築方式更往東推進，在西普魯士（今屬波蘭）建造了無數的農莊。

勞動的故事仍有續集。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發生於前蘇聯車諾比核能電廠的事故，澈底粉碎核能是乾淨能源的高科技神話。在事件發生後，百分之七十的輻射物質往北，即白俄的方向飄散，使白俄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受到嚴重污染。新生兒過高的畸形率，時而可見孱弱與罹患癌症的病童，都是輻射污染顯而易見的後果。一直到18年後的今天，事件還沒有結束。超過兩百萬的居民依然居住在受到高輻射劑量污染的白俄、烏克蘭與俄羅斯，其中六十萬是孩童與青少年。

一九九〇年，德國家園協會Dietrich von Bodelschwingh牧師在蘇聯解體、邊界開放後的夏天，在「和平腳踏車」的旅程中，目睹同時存在於城市與鄉村，令人無法想像的貧困與疾病，產生了一個想法：必須幫助受到輻射污染的災民離開污染區，另建家園。

以木爲梁，灌注黏土與木屑造牆的「黏土木架屋」，是在世界許多地方都可以看見的傳統建築方式。找一塊乾淨的土地，以健康、自然、就地取材的建築方式，以團體、社區參與的互助形態，以未經專業訓練的手，大家協力蓋起房子，重新開始有新鮮的空氣、乾淨的水、過健康日子的新生活，就是這個自助同時也助人，把反核融入生活的實際行動。

從一九九一年開始，Dietrich von Bodelschwingh牧師在夏天開著半舊、漆著「人道援助」的小卡車，每年三梯次，每次三星期，結合30位德國志工，載運著工具也載運著希望，到白俄與車諾比災民一起在Drushnaja村莊建起自己的新家園。在這個包含工匠、研究人員、學生、退休人士、男人與女人的團體，靠著各界的捐款，在白俄度過三星期令人難忘的勞動假期，也在沒有被輻射污染的Drushnaja村莊蓋起33棟黏土木架屋。

十多年來，在這個至少有一千多人參與過的勞動假期中，反核不僅僅是一種理念，更在攪拌木屑與搬運黏土的體力活動中成爲一種實踐，一種對消費生活的反省和對自然與簡單生活的想望。在白俄與德國過去兩次大戰的敵對歷史中，德國志工不僅與車諾比災民共同創造一個乾淨的未來，也在勞動假期中與歷史

對話，同時也與自己對話；與歷史和解，也與自己和解。

二〇〇三年三月，一群來自台灣各階層的志工在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布農族卡社部落蓋「友善的房子」。這勞動的故事在台灣有了續集，也有了新的開始。

這個結合綠色主義實踐，強調人本生活與互相尊重的建造活動，是由德國「汗得學社」（HAND Initiative e.V.）與「家園協會」合作，在清華大學彭明輝教授引薦下由新竹文化協會謝英俊建築師提供在地協調，與來自台灣各階層一百多位志工以協力與輪作的方式，從刨木做釘、鑽木做榫開始，在揮汗中撐起木構、掄袖攪拌泥水木屑，也在大家不在意「弄髒」雙手的同時，隨著屋牆愈築愈高，藏在我們心裡那面隔絕人與人互信互諒的高牆，已經一點一滴地崩塌。

於是，從二〇〇三年三月三日到三月二十八日四個星期的勞動中，從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的流汗歡笑中，從一塊動手打造「友善的房子」中，一同創造勞動的故事。

在環境保護的脈絡下，「黏土木架屋」不僅展現傳統工法的新生，同時也是強調節能與健康居住的建築。這種建築，不僅在世界各地，也在台灣的傳統建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這個強調「共同參與」與傳統工法的協力造屋計畫中，無論小孩、年輕人，還是老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專業還是非專業，大家都可以在任何付出勞力與時間的地方，發現自己的潛力，收穫努力的成就。這是一個強調社會參與式的建築方式，也是找回信心，成就自己的方式。這個被成就的自己，不僅是被幫助的災民，也可以是幫助災民的志工。

從科技史與科技社會學的角度來觀察這個活動，透過復古工法的實踐，我們得以張大眼睛，看到台灣傳統穿斗式建築的牆體在外觀上與德國黏土木架屋的相近，以及古早使用黏土、糯米、紅糖與牛糞來塗抹竹編造牆的技術。這是一個藉由認識異文化來認識本土文化的經驗。

所以，這棟站立在潭南的「友善的房子」，其實是文化與時空錯置下的產物。這樣的工法如何可能與本土的工法產生對話，以促成我們張開眼睛見到曾經視而不見的本土文化，以及如何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喚醒被遺忘與被忽略的技藝／記憶，是蓋這棟友善房子最大的期望。

然而，在學院與社會實踐的領域中間，並不存在一條清楚的界線，但也沒有連串兩邊的橋梁。在蓋房子的整個實踐過程中，身爲STS的研究者，我常常得面臨應該以學術的專業來進行社會觀察，還是以實踐的倫理來貫徹計畫的考量。究竟在整個計畫裡，我是站在學術的圈內還是圈外？主要的目的是進行社會實踐的觀察評論，還是把房子蓋起來？在這邊界不清楚的兩個領域間，也在這勞動的故事進行中，對我來說在在充滿對自我的挑戰與回應。

因此，當有人問起爲什麼在二〇〇三年三月，「汗得」在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布農族卡社部落，以DIO－Do It Ourselves 爲名，與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蓋起一棟友善的房子，與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建立起難得的友誼？

「汗得」想做的，其實就是以對專業、對工法、對實作知識的尊重，試圖以德國工法在文化與時空的刻意錯置下，喚起傳統工法的可能新生。這樣的新生不會是原型的複製，而是以現代的材料，輔以節能、和環境相容與健康居住的思維所帶來的復甦。在這個復甦的過程中，我們試圖找回一個與舊價值相連結的新價值。

然而，價值不是被賦予的，而是希望透過對話與討論，以及親身實踐與勞動所成就出來的。因此，一個開放的論壇，一個因爲不同議題而產生的相聚機會，是我們蓋友善房子的理由。因此，「蓋友善房子」的重點不在解決居住的問題，而在於「我們一起做一件事情」。「蓋友善房子」的重點不僅在於蓋有形的房子，更在於蓋無形的房子。

這便是在舊科技中實踐出的新思維，一個透過勞動來闡述的故事。 □

胡湘玲

本文作者任教於德國魯爾波鴻大學東亞研究學院「跨文化生物科技倫理整合型計畫」，同時也是德國汗得學社（HAND Initiative e.V.）負責人。「汗得」的網址 http://hand.ngo.org.tw